

鲁迅思想之启蒙与立人

夏 雨

(伊犁师范大学 新疆伊宁市 835000)

【摘 要】鲁迅先生在《文化偏执论》一文中,提出一切事情的根本在人,人立了,所有事情都可以办成,人的启蒙成为一切事情成功的根本。纵观鲁迅先生的创作,他关心孩子、女性和一些贫苦的人们。他想利用文学的力量来改变人的精神,改良社会。他自创作伊始,就坚定地行走在启蒙和立人之路路上。

【关键词】鲁迅;启蒙;立人

DOI: 10.18686/jyyxx.v3i7.50450

鲁迅 1898 年奔赴南京,开始了他一生的“走异路,逃异地”的求索之旅。在南京四年的求学生涯里他有幸读到思想家严复的译著《天演论》。严复翻译《天演论》时用译语“忧患”表示痛苦与烦恼。严复认为随着社会组织的形成,人的忧患意识便会产生,忧患意识的深与浅意味着社会责任感的重与轻。托尔斯泰有一次生气地皱着眉头对友人说“我们大家都在设法免除自己对他人应尽的责任,而事实上正是这种责任感使我们成为一个人。”纪德也曾说过人的幸福不在于获得个人的自由,而在于为他人社会甚至为整个世界承担某种责任。鲁迅身上最可宝贵的品质就是对国家对民族始终抱有强烈的责任感,这责任感折磨着他,仿若《过客》里的过客,看清自己的历史中间物身份,不肯如那老翁般休息在檐下,不肯安常处顺,始终狂走在启蒙之路路上,哪怕明知终点是坟地,走得鲜血染满双脚,也在所不辞,只为实践他所谓用文艺运动来改变人的精神的理想。

1 始于呐喊

1902 年,21 岁的鲁迅留学日本,先入弘文书院预科日文,两年后入仙台医学专医。留日同学许寿裳说鲁迅常常和他探讨关于国民性的大问题:理想的人性是什么?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病根何在?^[1]

1906 年 3 月,鲁迅经历幻灯片事件,中国人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人抓住,准备砍首示众,无论是中间被绑的示众者,还是看客,同样体格健壮而显出麻木的神色,鲁迅终于醒悟目前最急迫的事是人的精神的觉醒,否则“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2]幻灯片事件刺激了他关于理想人性的长久以来的思考,就此告别藤野先生,弃医从文,走上用文艺运动来“改变人的精神”的启蒙之路。

1907 到 1908 年间,鲁迅在日本相继发表《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执论》《摩罗诗力说》和《破恶声论》。《文化偏执论》提出一切事情“根底在人”,“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是举”。《摩罗诗力说》介绍和评论了一些被压迫民族的诗人和他们的作品,如拜伦、雪莱、易卜生、尼采、莱蒙托夫、普希金以及匈牙利诗人裴多菲。鲁迅试图“从人的精神之上征当中寻求民族的救亡方策”。鲁迅

言之所谓“人”,就是摆脱奴隶主和奴隶的循环怪圈,走在无限向上延伸之道路路上的人。《破恶声论》提出“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人各自立,则国家立。

1909 年 7 月,鲁迅回国,在希望与失望的交替中度过他近九年的沉淀期,学者竹内好称这一时期是鲁迅的内省期,即通过自我否定达到全面的自我觉醒。

1918 年某个夏夜,在绍兴会馆的院子里,《新青年》编辑组成员钱玄同约稿鲁迅时,鲁迅对时代对人很绝望,他把时代比喻成一间黑暗的铁屋子,没有窗户,绝难冲出,他认为大部分人都在铁屋里昏睡,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从昏睡走向死亡,也许不会感到死亡的悲伤。但启蒙家们大声嚷嚷,会惊起较为清醒的几个人,这些人醒过来就不容易再睡下,结果无路可走,只能醒着面对死亡,这让鲁迅感到痛苦。钱玄同答:“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2]鲁迅终于答应钱玄同,写成《狂人日记》,并于 1918 年 5 月在《新青年》上刊出。之前的全部积累全是铺垫,到《狂人日记》,他开始以鲁迅之名行走在立人之路路上,直到生命的最后。

2 “救救孩子”

《狂人日记》,发表于 1918 年 5 月《新青年》四卷 5 号上,署名鲁迅。这是现代文学第一篇公开发表的白话小说。题材新颖,格式特别,语言充满了张力色彩,日记体小说的形式,第一人称的写作手法,仿照果戈里的同名小说写成,却比果戈里小说忧愤深广得多。鲁迅先生在这篇文里投注了自己关于启蒙关于立人关于国民性等问题的深刻思考,他终于开始实践《〈呐喊〉自序》所言用文艺来改变人的精神的启蒙理想了。《狂人日记》用第一人称“我”进入叙事场,通篇描写“我”对周围人周围环境的发现,以及在这个发现的过程里“我”的心理活动。用学者北岗正子的观点来说,《狂人日记》描述了重新发现“人”的过程。

《狂人日记》塑造了一个时时刻刻活在恐惧里的狂人。狂人最初发现月光、路人、哥哥、医生都似乎吃过人或者将要吃人,最后,在回忆里,猛然惊觉自己未必不在无意中吃过自己死去的妹妹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自己将要被吃。这一惊觉让狂人幡然醒悟,吃过人的人就不再

是“真的人”，“真的人”在哪里呢？最后，狂人喊出“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鲁迅借由这篇小说告诉我们，内省是一切变革的发端，掘心自食，审视自己，才能重建“真的人”。并第一次明确提出救救孩子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和迫切性。

1918年9月，鲁迅做《随感录二十五》，进一步指出父辈改变对孩子的教育理念的重要性，鲁迅认为，如若小的时候，不把孩子当人，大了以后，孩子也做不了人。因此，生了孩子，还要想怎样教育，才能使这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这篇随感录过于简短，没能充分表达关于这一命题的思考。1919年11月，鲁迅以唐俟为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更进一步分析指出关于父辈对孩子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改革的具体内容——清洁旧账，开辟新路——自己先觉醒，洗净古传的谬误思想，对子女，义务多一些，权力少一些，尊重幼者，而这幼将来对他们的幼者也是如此，良性循环下去，理解、指导、最终解放自己孩子，谈及“解放”时，先生认为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类中的人。因为孩子是因我们而来，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但同时，孩子又是脱离我们的独立的存在，所以父辈们应同时解放他们的孩子，让他们真正成为他们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这样的独立的人，因以父辈做踏板，超越父辈，向着更高更远的地方行进去。正如鲁迅所言，父辈“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3]

如果杂文所表达的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在小说《故乡》里，作者使这一抽象的概念故事化、具体化。《故乡》写于1921年1月。散淡的故事情节，忧伤的笔调，克制的情感，渺茫的希望。作者冒着严寒回到相隔千里，离开了二十余年的故乡，见到他的儿时好友闰土，如见已是中年，闰土见到儿时好友，激动但不知该说些什么，只规规矩矩站着，分明地向着“我”叫了一声“老爷”，仿佛千言万语都无从说起。作者感慨自己和闰土的隔膜竟如此之深，仿佛在他们之间立着一道高墙，没有相互理解的通道，他渴望人与人的相通和理解，渴望人与人能如少年般谈天说地，天真烂漫。回忆少年闰土，对照眼前辛苦麻木的中年闰土，他有些不知所措。他希望侄子宏儿和闰土的孩子水生不再隔膜，希望那个戴着银项圈的看瓜少年永在他的记忆里，希望晚生后辈宏儿和水生们能以自己和闰土做踏板，走向更高远的未来，他想象“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2]

3 “娜拉走后怎样”

1918年7月，鲁迅针对女性命运做《我之节烈观》，于当年8月发表在《新青年》上。先生在文中就传统文化之女性“节烈”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指出女子节烈于己于国都无益，但为何还要节烈呢？原因是“妇者服也，理应服事于人。教育固不可必，连开口也都犯法。他（女性）的精神，也同体质一样，成了畸形”，最后这些女性在残

苦中无声地死去，做了无主名的牺牲。文末，先生为女性发出苦痛的呐喊，警醒我们追悼这些女性，同时发愿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但女性该如何获得“正当的幸福”？道阻且长。

1923年12月，鲁迅专门去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做了一场名为“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此时早已传入中国，很多知识女性受娜拉影响，被鼓舞着。单纯拥有勇气是否就可以获得正当的幸福？先生看出“娜拉热”背后的危险。在讲演中，他郑重指出，易卜生一再坦言自己创作《玩偶之家》只是做了一首诗，并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并代为解答。诗可以沸腾我们，但要如诗般生活需要理性冷静的分析，简言之，娜拉出走是一首诗，是一幕剧，大幕落下，掌声响起。至于娜拉走向何方？出走之后如何生活？剧终人散，无人知晓。鲁迅在讲演中追问出关键问题——娜拉出走，除了带上一颗觉醒的心，还应该带上什么呢？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鲁迅提醒女性，要觉醒，但也要警惕，在毫无准备中觉醒，必然要承受这觉醒的痛苦。鲁迅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事不要去惊醒他。”^[3]那么，可走的路在哪里呢？也许，先不要问路，先在家里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在社会上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而这自由平等的权柄如何获得，还需要持久而艰难的战斗。

《娜拉走后怎样》是一篇演讲稿，也许说教味重了点。两年之后，鲁迅借助小说《伤逝》再次提出“娜拉走后怎样”这个事关女性命运的重要话题。

《伤逝》写于1925年，是一篇回忆性散文体小说。小说主线很明确，写了女青年子君和男青年涓生的爱情故事。以第一人称涓生的视角追忆了他和子君的爱情之路，从最初的甜蜜的春天，到最后的无爱的冬天，从热恋到死亡。恋爱时，他们终日谈论雪莱、拜伦、易卜生，半年之后，子君终于说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犹如娜拉，走出了家门，开始了她和涓生的自由恋爱之路。两个青年拿出自己的大部分积蓄，开始了同居生活。有过甜蜜，有过短暂的幸福，但很快涓生失业，入不敷出，生活陷入困顿，爱情渐渐变得难堪，成为负担。直到一个极冷的清晨，涓生说出那句话，“我老实说罢：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爱情到此彻底消亡，覆水难收。后来，子君被父亲领回了家，很快死去……有多少男女能经得住琐碎日常的考验？涓生和子君也不过是普通的饮食男女，逃不过这物质的折磨和人性的测验，至于“爱”，早就无从谈起。

子君出走，回来，死去，至少表明“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女性在独立之路上需要太多理性而持久的战斗。打破包办婚姻倡导男女自由恋爱是当时的社会热潮，但单纯拥有爱情、热情、勇气是否就可以如愿以偿获得幸福？《伤逝》其文以一个爱情悲剧再次回应了“娜拉走后怎样”这一沉重的时代命题。

4 和光同尘

《起死》是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一篇，鲁迅先生最后一篇小说。说的是庄子复活了一个已经死了 500 年的汉子的故事。故事围绕庄子 and 被复活的汉子之间的对话展开。这篇文章是先生借古人给我们讲的一个严肃的笑话。庄子旅途无聊，要找人聊天，于是复活了草丛间躺着的一具骷髅，活转过来的骷髅是一个汉子，三十多岁。庄子和汉子的对话就此展开，由对话得知，汉子已经死了 500 年了，汉子并不相信自己已经死了 500 年这个事实，一再追问自己的衣服包裹和伞的下落，甚至上来扯庄子的衣服，直到巡警赶来，庄子才得以脱身。整个故事充满了无奈、滑稽和讽刺性，看出先生不安的心境。挫败感犹如大毒蛇缠住身与心。他看出自己的渺小，看出自己“空头文学家”的无奈。汉子由昏厥中死去，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但 500 年后被复活，他必然面对无家可回的困境，也必将再一次面对死亡，他必将经历梦醒了无路可走的悲凉。面对汉子，庄子只能在仓皇中逃走。实在是别无他法。

他曾在 1936 年 9 月写下一篇名为《死》的文，叮嘱亲人，万不可让孩子做“空头文学家”……这是他最后一篇文章，他死在那一年的 10 月。

鲁迅对同时代很多文人都失望，认为他们不该在文中只谈论花草虫鱼，也该谈论黑暗与黑暗中的奋进，谈论希望与绝望，谈论对绝望的反抗，这是文人的责任，如顾炎武言：“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又或者，要谈风月就大手笔来谈，超越年代地域邦国，写尽人与情，甚至超越情。

“智极成圣，情极成佛”。如《红楼梦》，他喜欢《红楼梦》。曹雪芹可以让“万景皆备”的大观园彻底荒芜也不怜惜，可以浓墨重彩写景，也可以荒废这浓墨重彩，这一切只为人。说到底，人是最重要的。

【参考文献】

- [1] 徐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M].长沙:岳麓书社, 2011.
- [2] 鲁迅.鲁迅小说全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1.
- [3] 鲁迅.鲁迅杂文全集·上[M].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1.

其实鲁迅对自己更失望。他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哪里有资格谴责什么或者唤醒什么，那狂人查看历史时就陡然发现，自己也“混在其中吃了多年的人”。已“吃过人”却还教导别人“不要吃人”，这是自欺也是欺人。可他自己毫无办法，因为“前面有个声音在叫他”，只能一路向西，如《野草》中那过客。他喜欢老子，却愿意行孔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希望他和他的文能“速朽”，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独自远去，跟上来的年代最好连他的背影也遗忘掉。“历史中间物”怎么能够永远存在？他渴盼“熔岩”喷出“烧尽一切野草”。他太爱中国，他希望自己能如狂人般对铁屋里的一切人提出盘诘、质疑。他“较永久悲悯他们的前途，然而仇恨他们的现在”。

鲁迅希望我们都做那萤火，不必找光，自己就是光。自立然后立人。

启蒙与立人的过程任重而道远，鲁迅用半生的岁月做这件事，努力而又认真，从小说到散文到杂文，包括译著在内，都在探讨人与人的精神，他想要用文艺改变人的精神，想要用文艺来启蒙大众，想打破蒙蔽在大众的精神世界的厚障壁，想要用笔画出沉默的国人的魂灵，想要所有人走出高墙，走向广阔的天地，自己开口说话。当然，鲁迅的启蒙与立人之路充满了不安和犹豫，这恰恰显出鲁迅的质朴，不唱高调，不空许未来，不轻言希望。

一切都如地上的路，最初没有路，时代的先行者们犹如萤火发出光，在黑暗中不断地找路，越来越多的人跟上去，荒芜之地就成了路……

作者简介：夏雨（1978.3—），女，新疆伊宁人，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课题：自治区普通高校教改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思政改革研究（2019YLJG12）阶段成果。